

292

B 222.05

231

儒商与现代社会

义利关系的社会学之辨

张德胜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商与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社会学之辨/张德胜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ISBN 7-305-03785-0

I. 儒... II. 张... III. 儒家-伦理学-影响-商业经营-研究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189 号

书 名 儒商与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社会学之辨

著 者 张德胜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3596923 025-3592317 传真 025-3303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函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4.875 字数 123 千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ISBN 7-305-03785-0/C·114

定 价 10.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
门联系调换

自序

过去五六年来,我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得到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编号:CUHK322/95H)进行多项研究。本书所报道的,就是其中一个项目的研究成果。

我之所以对儒商有兴趣,是想在他们身上看看人在面对义利冲突时如何自处。这是古今中外人类的共同问题,但是现代化程度愈高的社会,此一问题愈形逼切,盖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要的是提高工具理性,可是提高之后,马上会带来工具理性泛滥和霸道的问题。

工具理性引人入胜之处,在于促进办事效率,节省资源,运用最合理的程序与手段去达到目标,加强对客观世界里的人、事和物的控制,提高竞争能力,将人类物质生活带到更高水平。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在实效方面拥有无可置辩的优越性,它所主宰的生活形态遂不断膨胀,逐渐侵入日常生活世界的每一领域,以致人类一些基本价值备受蹂躏,传统上赖以凝聚社会的力量分崩离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个人所面对的心理压力也愈来愈大。在工具理性支配之下,人的思维总是实效至上,并且以自我为中心,于是乎利字当头,情与义无立锥之地,这实在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也是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现代之旅”(project of modernity)

的理论传统里深切反省的问题。

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人一旦卷入竞争或制胜处境，就只好按照工具理性的指令去做，此外没有选择余地。人非但不能在技术手段与非技术手段之间选择，也无法在几种技术手段之间选择，因为最有效的一种必然脱颖而出。正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当然可以维护选择自由，选择一些传统的、有人情味的、道德的或者是一厢情愿的手段，但是与人竞争时就难逃被淘汰、被击溃的厄运。他也可以采纳最有效的技术手段，从而成为胜利者，却因此丧失了选择自由，无可奈何地受技术手段所支配，按照工具理性所设定的游戏规则去生活。

以上论点，背后有个假定，就是人的行动以胜利或追求最大效益（或称利）为依归。当此目标与自己所信守的道德原则（或称义）相悖时，他会取利舍义。很显然，这个假定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以文天祥为例，他宁死不屈，保留了选择权利。尤有进者，义与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零和关系，只是多取与少取之别。本书报道一些企业家的营商活动，他们尽量在义与利之间取得平衡，就是最佳的说明。所以，究竟是工具理性过于霸道，逼得现代人身不由己？还是现代人一味热衷于利，从而放弃了选择权利呢？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当然，工具理性的威力是无与伦比的。与之抗衡多少要抱着孔子在生时那种力挽狂澜于既倒、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问题是：我们宁可放弃自主，任令工具理性摆布？还是自觉地负隅顽抗，在逆境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呢？本书介绍一些当代儒商的事迹和想法，也许会给我们一点点的启示。

这本薄薄的书，其实盛载着许多人的浓情厚意。没有他们帮忙，肯定成不了事。首先要多谢一刻千金却拨冗现身说法的企业家，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大多是籍籍无名的商人，在风雷激变的市场为坚持自己的理念而孜孜矻矻。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现代反

省生命意义的活水泉源。他们散布于几个华人社会，全赖一些热心的朋友和相熟，如李金铨、莫邦豪、许倬云、香树辉、宋林飞、吴力子、谢遐龄、周晓虹、范丽珠、林孟秋、杨汝万、丘海雄、瞿海源、李焯然、高耀中、陆绯云、潘亚瞰、李金汉、胡守钧、李伟东、钊哲园、郑赤琰、罗富昌等从中穿针引线，结合因缘。在这里特别要向晓虹兄致意，他陪同我从南京远赴曲阜访问那里的一位儒商，并且充当翻译，实在感激不已！

在撰写书稿过程中，第二章的文献回顾有部分是陈和顺博士帮忙做的，而侯杰教授在第三章散财观念的资料收集方面居功不少。我还未学懂中文打字之前，全靠李林艳、陈家钰、吴葐仪等鼎力相助。当我遇到计算机技术问题时，总是黄少峰和吴葐仪帮我解决的。书中所呈现的疏漏，纯粹是作者的责任，与上述各人无关。本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多得周怡和金眉居间筹谋，玉成其事，于此一并致谢！

最后，本书所牵涉的研究计划原来是与亦师亦友的金耀基教授合作做的，他除了策划时提出意见之外，还参加了其中的两个访问。后来碍于人贵事忙，很难腾出额外的精力和时间进行这项研究。书成之后，我本来把他列为作者之一，但他力辞不受，只好在此补上一笔，交代我们的一段合作情谊，也借此感谢他一如既往的支持。

张德胜

2001年9月29日于香港

目 录

自序

第一章 理论脉络

- 第一节 现代社会的理性特征..... 1
- 第二节 三种理性及理性化趋势..... 5
- 第三节 工具理性的横决及对应方案 17

第二章 研究传统

- 第一节 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的论述转向 33
- 第二节 儒商研究述评 46
- 第三节 义利关系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49

第三章 历史踪迹

- 第一节 儒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 66
- 第二节 儒家伦理与新教伦理的义利观比较 73
- 第三节 明清商人的散财观念 79

第四章 性格结构

- 第一节 儒商的鉴定 86

第二节	儒商样板	90
第三节	通俗之儒	96

第五章 市场压力

第一节	市场立足	111
第二节	企业管理	120
第三节	生意经营	126

第六章	结论	144
------------	----------	-----

第一章

理论脉络

第一节 现代社会的理性特征

本书以儒商为切入点,借此探讨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所可能发挥的作用。所谓儒商,是指怀抱儒家道德价值的商人。或者说,儒家思想是传统时代小农社会的产物,既不讲民主法制,也不彰显人权自由,至于科学理性,更与儒家学说的规范性质风马牛不相及。在已经是 21 世纪的今天,还重提儒家价值,究竟有何现实意义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且让我们分析一下现代社会的特征。

现代社会复杂多变,万象纷呈,要描述它的特征,多少有点似盲人摸象,执著一点或一片都可以言之成理,譬如工业化、个人主义、成就取向、阶级流动、核心家庭、消费主义等等,如果不把抽象层次提高,如此点算下去,恐怕会是个 1000 年也说不完的故事。然而,提高抽象层次之后,该用什么来概括现代社会的特征呢?

其实“现代”一词并不现代,起码可以追溯到公元 5 世纪,那时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奠定了正统地位,为了与罗马时代的异教信仰划清界限,于是用“现代”一词来显示历史已经迈向新的纪元。其

后此词的意涵不断转变,但万变不离其宗,无非为了表达一个时代的人所意识到的时代更替。^①这有点像段玉裁所指的古今之别,他说:“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②

现时我们所指的现代社会,一般公认由 15 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③不过现代意识趋于成熟,则是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事。那时候,理性的力量开始很清楚地呈现出来。柯思乐(Ernest Cassirer)指出,启蒙时代的哲人普遍感觉到一股新的力量,通过各种形式流布于社会,他们称之为“理性”(reason)。他说:“理性成为这个世纪的中心点和统合点,表达了这个世纪梦寐以求的以及实际已经获得的种种成就。”^④从那个时代开始,理性在西方社会逐渐取代宗教的角色,成为统合社会的力量。柯思乐又说:“18 世纪充满了这样的信念:理性的永恒与统一。对于所有有识之士,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甚至所有文化来说,理性都是同一的。”^⑤

以理性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并不是说现代社会在任何一方面都是理性的,而是说,现代化的变迁大势是个趋向理性的过程,亦即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⑥关于这个过程,有两点是需要说明的。第一,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会有起伏。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党人集体屠杀犹太裔民众,便是反理性的极端行动。但是,就像成熟证券市场的蓝筹股票价格一样,理性化过程的长远走势是反复向上的。第二,社会理性化与个人的理性行动应该是有关联的。诚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言,每个人追求自己最大的效益,便会提升整个社会的效益,后者是前者的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⑦然而,个人理性行动的意外后果并非都是正面的,譬如个别厂商致力增加利润,会破坏环境,到头来整体受害,便是个人理性意愿导致集体不理性后果的典型例子。除非人类可以协调彼此之间的行动,否则理性的意愿不能保证会有理性的结果。尽管理性化有着这些悬而未决

的因素,但证诸以往历史,理性化不仅是一种向往,也不仅限于个人层次,而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历程。^⑧这点下文将会论及,于此暂且按下不表。

然而,什么是理性和理性化呢?韦伯虽然以理性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却从未明确地界定过这个名词。^⑨按照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的分析,韦伯使用理性一词,起码有16个不同的含义。他说:“现代资本主义是如此界定的:把形式上自由的劳动力理性地(指有系统和可计算)组织起来,依理性的(指准确的、纯数量的)会计程序,在理性的(指有规可循的、可预测的)法律和政治体制保障下的市场理性地(指非人情和纯工具性的)交换。至于禁欲的新教伦理的特征,则是理性地(指有条不紊)自持,然后理性地(指有目标地)投入理性的(指认真的、审慎的)经济行动,以此作为理性的(指心理上有效和逻辑上可理解)的手段,去纾解由理性的(指连贯一致的)预选说给个人所带来的巨大无比的压力。”^⑩

其实,这段引文所列出的各种理性的含义,与其说不同,毋宁说是同一事物于不同处境所呈现的不同形态。换言之,基本上还是牵涉到抽象层次的问题。然而,这个同一的事物是什么呢?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就是通过反省而确认的一种该当如此的合理状态,有时也指达到此种状态的能力。惟其合理,就经得起批评,所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说:“理性是面对批评时维护某种表达的能力。表达可以是陈述,或者是目标取向行动。”他又补充说:“有理据的言辞及有效的行动,是理性的标志。”^⑪

理性如此定义,本身是个套套逻辑(tautology),或称形式定义(formal definition),属于分析命题(analytical proposition),因为光就字面而言,不合理的不能算是理性,反之亦然。这犹之乎1等于1,必然是对的。既然是形式定义,便不包含经验内容,但是若将抽象层次降低,则不同种类的理性可以有不同的实质内容,譬如工具理性是指达到目标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资源及程序的合

理状态；价值理性就是指某种生活方式的合理状态，也指某一价值体系之内各种行动信条之间的合理状态，以及行动者依从某一价值体系的所作所为的合理状态；而哈贝马斯则把沟通理性界定为参与沟通的双方或多方达致了解的最佳状态，亦可以视之为合理状态。^⑫

以合理状态界定理性，首先要通过罗斯(John Rawls)的思辨关防。按照约定俗成的用法，再沿袭薛布尼(W. M. Sibley)的论点，他认为“理性的”(rational)与“合理的”(reasonable)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⑬前者主要处理手段和目标的关系，涉及彼此优先次序的排列；后者则有平等对待之意。关于理性行动，他有两点附加说明：一是理性行动者的推理不限于手段与目标之间，因为他们亦会平衡自己行动的最终目标与整个生活计划(plan of life)是否协调。二是理性行动者不一定追求私利，他们同样热爱社会、国家，乃至于大自然。^⑭

罗斯指出，理性行动者所缺乏的，也正是合理行动者所具备的，是一种愿意与别人公平合作的道德触觉。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合理行动者是“公共的”(public)，而理性行动者则没有这一特性。基于合理的安排，众人可以本着平等身份进入公共世界，愿意提出及接纳与人合作的公平条件。罗斯声言，合理行动者既非利他(altruistic)，也不是纯粹自利。在合理的社会，大家可以理性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只是要在公平的条件之下进行。^⑮

既然“理性的”和“合理的”两词含义不同，这里为什么又把二者合而为一呢？其实所谓不同，只是抽象层次的差异而已。如上所言，尽管罗斯提出两点补充意见，他对理性一词的理解，大体上是属于工具理性，稍微触及价值理性，缺乏沟通理性，已经牵涉到不同理性类型的实质内容，而此处赋予以理性的定义，是超越实质内容的形式定义，抽象层次有所提升。从低一个抽象层次来看，一般所理解的理性(以工具理性为主)与合理性确实是有分别的，但是

把抽象层次提高之后,则合理是理,理性也是理。百川汇合,殊途同归。

理性是西方思想的核心概念,自希腊时代以来,贯穿着整部西方哲学史,用得很泛,歧义也不少。^⑩笔者以合理状态来界定理性,不敢肯定能否统揽前人的所有用法。即使不能够,也不是个大问题,重要的是可以由此而提供一把钥匙,帮助我们去了解现代社会的奥秘。由艾苇士(Paul Edwards)编纂的《哲学百科词典》在“理性”(reason)一词之下有这样的说明:“然则理性是什么呢?或者说,推理是什么呢?不容易有个明确的答案。哲学家及其他作者使用有关名词的定义,有意无意间出现很大和很明显的分歧。有些用法可能较其余为佳,或者更接近日常用语的理解,但是如果说某一个单独的意义是正确的,因而解答了上述问题的话,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如何,要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哲学论著,并非必须知道‘理性’是什么,而是尽量辨明作者赋予此一名词的意义。”^⑪

第二节 三种理性及理性化趋势

如果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理性,而现代化就是理性化的话,那么,与传统时代相比,现代社会应该是把事物变得更为合理,实况是否如此呢?首先要指出,所谓“合理状态”,有个相对于什么而言的问题,即是说,究竟以什么标准来判断现代社会的事情较传统社会更为合理呢?或者说,这个理是个怎么样的理呢?

哈贝马斯一向强调知识与实践的紧密关系,在早期论著之中便依人类的主要活动领域而将知识分为三类:第一,是源自工作,为了达到所定目标而发展出来的实证分析科学(empirical-analytical science);第二,是人有需要与人沟通交往,为了掌握真义而孕育出来的历史诠释学(hermeneutic-historical science);第三,出于

自由与自主的诉求,通过意识的觉醒来检视现状,从而成就了批判学(critical science)这样的知识体系。^⑮

上述三类活动,除了各自有相应的知识体系之外,还有相应的合理状态。从达到目标这个准则来看,所关注的是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程序的安排是否合理?所用的手段是否合理?凡此种种的合理状态,称之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有时又叫做目标理性(purposive rationality)、科学理性(scientific rationality)、技术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能够用数字表达的,是谓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为了方便起见,姑且统称工具理性。顾名思义,工具理性就是只讲手段,不问目标。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管目标是什么,只要目标已定,便会提供达到这个目标的最佳手段。战场与商场是工具理性最易彰显的地方,理由很简单,因为目标已定而且确切无疑:前者为了胜利,后者旨在赚钱,同是充满竞争气味的制胜处境,或者说是弱肉强食的赛场(arena)。

在沟通行动方面,也有相应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哈贝马斯最杰出的贡献,便是在这个领域有所发明。他检讨理性这个概念时,批评韦伯的理解过于狭隘,“只从使用手段的角度来考虑理性”。他指出,目标取向行动与沟通行动最大的分野,在于前者是单向的、独白的(monological),只从行动者的角度来思索如何达到目标;而后者则互相依赖,必须讲求彼此协调。所以,沟通行动要求的合理状态,便不是手段、资源或程序的配置和安排,而是增进了解。因此,哈贝马斯把沟通理性界定为双方或多方达到了解的最佳状态,亦即是他所指的“理想的言辞处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⑯在这种处境中,所有参与者都有平等的机会对话,在毫无拘束的情况下,互相承认对方的言辞行动(speech act)是可以理解的、真实的、诚恳的、得体的。

说到批判行动,必然带出“怎样的生活状态才是合理状态?”诸如此类的问题,既不关乎手段运用,亦非增进了解,而是直接牵涉

到终极目标(一种生活状态)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由于厘定行动的最终目标涉及价值标准,故称这种合理状态为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以人类登陆月球为例,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是不会讨论这个目标合理与否的,只会关心资源、手段及程序的有效布置和运用。要达到人类登陆月球这个目标,固然不可以一厢情愿,光是求神拜佛也无用,而是掌握科学的知识和技术,因为科学与技术是工具理性的结晶。但是如果我们问:地球上许多人还是两餐不继,为什么不把资源用在他们身上,却花于遥不可及的太空探索旅程呢?这么一来,问题已经走出工具理性的界限,直接质疑行动最终目标的合理性,是个价值理性的问题。

谈过三种理性之后,接着要讨论的问题是:现代化作为一个理性化过程,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变得更为合理呢?最明显的,莫过于工具理性了。随着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加快,工具理性也显著增长。表现在经济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取缔了中古的作业程序;表现在政治行政方面,是民族国家及科层制度次第形成;表现在思想方面,是逐渐掌握了许多客观世界的规律,从而大大提高了人类驾驭外在环境的能力,也就是科学和技术的突飞猛进。由于工具理性的转变太明显了,以致韦伯心目中的理性化过程,基本上是个工具理性化过程,而近人艾恺(Guy Alitto)在替现代化下定义的时候,也特别突出“擅理智”与“役自然”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④

其实,工具理性的增长,并不始于现代,而是贯穿着人类自古以来漫长的演变历程,因为正如奥格本(William Ogburn)指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控制能力(他称为物质文化),是可以积累的。^⑤除非储存这些知识的人全部同时死掉,否则人类社会工具理性的程度会持续提高。在人类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是否出现这种情况,难以稽考。即使有此可能而引致工具理性的积累中断,但另一个积累周期又会开始。总之,在每个周期之内,一部人类历史,就

是一部工具理性的发展史。既然如此，为什么说工具理性的增长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呢？原因是这种现象（或趋势）虽然古已有之，不过于今尤烈。从远古到现代，工具理性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到了现代如山洪暴发，展示无与伦比的威力，与传统农业社会的境况迥然不同。

至于沟通理性的发展趋势，便没有那么明显了。由于哈贝马斯是首先有系统地阐发这个概念的学者，就让我们沿着他的思路来把问题说明一下。按照他的分析，在现代之前，特别是原始部落，人纯粹活动于生活世界（life world），彼此间的行动以语言沟通，由规范导向。他秉承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观点，认为总的来说，生活世界是通过语言代代相传下去的。整个继替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延续（cultural transmission）；二是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三是社教化（socialization）。相对于这三个方面，便是生活世界的三个构成部分（structural components），即文化（culture）、社会（society）及性格（personality）。^②

哈贝马斯指出，在远古时代，生活世界的三个构成部分是混而为一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基本上受文化传统（特别是宗教观念）所支配，自我反省的余地有限。随着社会演变，生活世界经历了一个理性化过程（rationalization）。在这个过程中，三个构成部分逐渐分开，彼此相对独立。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是社会制度逐渐摆脱传统世界观的桎梏；从社会与性格的关系来看，人际关系的自主空间有所拓宽；从文化与性格的关系来看，则个人对文化传统愈来愈多批评与创新。^③当生活世界出现这样的结构分化（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逐渐摆脱文化传统的规限，彼此为了达到了解所必须建立的共识，其最终基础是较佳论据，而非规范遵循。这么一来，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亦替沟通行动的理性化创造了条件。

不过与此同时，一种哈贝马斯称之为“体制”（system）的东西

也从生活世界脱胎而来,在经济领域以市场(market)的面貌出现,在行政方面则形成了科层体制(bureaucracy)。以市场为例,它并不是精心策划的结果,而是无数个人自发地各自按照自己的价值和爱好,理性地有所行动而联合产生出来的总体效应。在这个“体制”之内,人与人之间并不像在生活世界那样依靠语言去沟通,而是使用货币这种非语言的媒介(delinguistified media)来交易,无形中亦摆脱了生活世界规范的羁绊。因此之故,体制内的行动纯粹以成功为归趋,属于策略性的工具理性行动,有别于构成生活世界的沟通行动。

此外,体制的秩序,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体制整合(system integration),亦与生活世界的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不同。后者建基于语言沟通或规范共认所达致的共识;前者则是无数自发行动(不经主观意志协调的行动)互相对冲所产生的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actions)。依亚当斯密的说法,就是有只无形的手在协调着各人的行动。

由于货币与权力此等非语言、非规范的交往媒介可以超越具体处境,具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因此随着社会演变,生活世界范围日益扩大,结构层次愈趋复杂,它们在协调人类行动方面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而滋生这些媒介的“体制”在日常生活世界所占的地盘,也日益拓展。

这里要说明一点,“体制”并不独立于人的行动之外,没有人的行动就没有“体制”,然而“体制”却是无数人各自行动的意外后果,故此也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具有独立生命的自控系统。所以,“体制”虽然从生活世界脱胎而出,但面世之后,便逐渐与母体分离。此外,不同的体制会互相连结,日益壮大,作为母体的生活世界相形缩小,反过来被“体制”所支配,沦为“体制”的殖民地。

总括来说,在远古或初民时代,“体制”未从生活世界分离出

来,人与人之间只有沟通行动,即使有功利目标,也通过沟通行动达到。这时候,社会结构单纯,人的意识深受传统规范所支配,没有多少反省的余地,可以说是有沟通而欠理性。后来社会演变,生活世界出现结构分化,沟通理性的潜力得以释放,以致在西方社会某个时期形成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④然而,随着现代化步伐加剧,“体制”壮大,侵蚀日常生活世界,使后者陷于荒芜境地,是个有理性(指工具理性)而无沟通的世界。由此可见,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沟通理性的发展并不像工具理性那样直线提升,而是多少类似山峦的有起有伏。

其实,哈贝马斯提出沟通理性,主要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问题,无形中触及另外一种理性,即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如前所言,价值理性是指行动最终目标的合理性。它不像工具理性那样,可以依据达到目标的有效程度去断定手段、资源及程序的配置是否合理。最终目标的合理性,也就是某种生活状态的合理性,往往牵涉到行动者的主观判断,因人而异,与时俱变。正是由于这个原故,韦伯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便弥漫着一片悲观情调。一方面,工具理性以无与伦比的威力急剧膨胀;另一方面,多种价值准则并存,无法通过科学程序判定高下。既然没有一个凌驾历史、公正无私、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原则,现代人只好凭自己的爱憎去选择价值体系,形成一个所谓“诸神交战”的局面,纷争在所难免。^⑤

现代人的价值观果真没有共同归趋吗?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由、平等和民主已经成为现代人公认的价值,是一股浩浩荡荡、莫之能御的世界潮流。正是这些价值理念,推动了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从而向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政治体制的典范。传统的农牧社会,差不多所有地方的统治方式都是君主(或族长)独裁,但自美、法革命之后,民主宪政无疑已成为现代社会惟一的正统体制。所有明显地偏离这种体制的政权,都要